

反革命两百万派张国焘

于 吉 楠

四、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

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

一九三二年秋，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仓皇西逃，拉着红四方百万主力，进入陕西，奔向川北。一路上，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且战且走，军队伤亡五千多人。

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军队议论纷纷。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章等许多同志，向张国焘已开了坚决斗争。曾中生同志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给张国焘写信，义正词严地批判了他的错误。张国焘的日子很不好过，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开会，听取大家意见。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错误和逃跑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对以后的活动作出决定报告党中央。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混过关，表面上“欢迎”提意见，并成立前敌委员会伪装发扬集体领导；实际上，严密封锁中央，待机进行反攻倒算。这场斗争虽然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对制止其仓皇逃跑、迅速建立川陕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十二月二十五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占领了通江县城，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四川，在地方军阀刘存厚、田頌尧、刘湘、杨森等的分裂割据下，混战连年不绝，工农群众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变蜂起，好似布满了干柴，随时都会燃成烈火。一九二八年春，党在万县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川东沈击军。一九二九年六月，邝继勋同志率军千余射洪咀起义，成立红军四川第一路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不久都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三一年，党又在梁山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沈击纵队，开辟了梁山、达县、开江三县交界地区的沈击根据地，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同志任军长，杨克明同志任政委。一九三二年八月，张逸民同志领导升钟寺起义，失败后又拉起两千多人的红色沈击队，后来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同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汇成一股革命巨流，很快建立起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包括十几个县、七百万人口的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扩大成五个军十万多人，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曾中生同志任参谋长，邝继勋同志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余笃山同志任总经理处主任。

但是，蓬勃发展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又被张国焘用阴谋手段篡夺了。他故伎重演，借口“肃反”，一方面，有计划的把张逸民同志等中共四川省委派到根据地担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二百多人，诬陷为“蒋介石特务”几乎全部杀光；连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和

党中央派到四川工作的序承志同志都被非法逮捕，长期关押；王维舟、杨克明同志被撤职，地方武装被强行改编。另一方面，又在红四方面军内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对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疯狂报复，阴谋陷害，于一九三三年夏，将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章等同志，先后秘密杀害。八月，张国焘又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捏造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同志，严刑拷打，强迫承认“错误”。曾中生同志坚持斗争，英勇不屈，遂遭长期监禁。张国焘把这一大批有理论、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打下去以后，换上一些工人、农民摆样子，实际上由张国焘大权独揽，实行军阀主义的独裁统治。他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以“书记最后决定”否定集体领导，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同时，“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大搞反党独立王国。

张国焘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的那些假左真右的机会主义错误，这时，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了掩盖其右派的真面目，他故意搞了一些极“左”的政策，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等等，但其根本内容则是右倾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他一贯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把红军当做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妄图用枪指挥党，全力在红四方面军中创造“张国焘个人的系统”。他把军阀军队的打骂制度搬到红军中来，随便骂人、打人、杀人，用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在军民关系中，他不是从政治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是以军队威临群众，并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破坏了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出动二十多万匪军，分六路向川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徐向前同志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实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经过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于一九三四年八月，首先取得东线反击战的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然后，转入西路反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共歼敌九个旅五万多人，至九月底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剿”，川陕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很好。但是，张国焘却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破了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开始了长征。他便认为这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害怕川陕根据地下一步将成为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重点，于是准备再一次西逃，发展了退却逃跑主义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张国焘致电中央，竭力夸大川陕根据地四周敌人的力量，还说什么“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就是他准备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信号。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一月二十日，红军从遵义地区西进，准备于四川上游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打电报给张国焘，把中央的战略意图告诉了他，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以主力向西南方向发展，争取进入西充、南

充、蓬溪地带，牵制四川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沅渡江，进入川西。但是，张国焘玩弄阴谋诡计，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反而集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北进攻，于一月二十四日发起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阳平关、沔县等地。这样，就使四川敌人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进行阻截，大批川军纷纷渡江南下，沿川贵边布防，并封锁长江，破坏了红一方面军渡江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回师遵义，南下贵阳西进云南，绕了一个大圈子转到金沙江渡江北上。等到川军主力南下阻击红一方面军时，张国焘又乘机慌忙将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陕南调回，借口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西逃跑。三月十九日，张国焘拉着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四月间渡过涪江，攻克茂县，进入川西地区。

这时，张国焘的反党夺权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早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中，就狂妄地宣称：要在“坚决进攻的策略下，坚持领导川陕鄂赣各省的沅击战争、群众骚动、工人罢工、兵变及回民运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张国焘又在茂县擅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在“西北特委”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五月三十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并在所发的《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布告》中，自称要“率领红四方面军卅万健儿，陕甘红26军，陕南红29军，川南红39军，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使我们党在长征路上，战胜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斗争。

篡党夺权野心的大暴露

一九三五年六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进入四川西部懋功地区。六月十二日，徐向前同志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六月十三日，两军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十万健儿纵情欢呼，中国革命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六月十四日，毛主席来到懋功的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夹道热烈欢迎。在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毛主席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在懋功地区，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明确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指明了新形势下，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

革命形势的变化，最容易暴露反党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坚持退却逃跑路线，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六

月十六日，党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明确告诉他：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目前计划宜在岷江以东坚决打击敌人即将到来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而懋功地区、大渡河两岸至岷山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公然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荒谬地提出要向川西北阿坝及甘肃、青海一带发展，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党中央两次复电，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地域进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南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使一时得手，也绝少继进前途；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頌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张国焘仍然置之不理。六月二十五日，在懋功两河口举行的两军会师大会上，张国焘公开宣布了他的右倾逃跑主义纲领，气焰嚣张地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芒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这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这个根本问题，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上，张国焘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否认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了，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荒僻的西部地区如川康、青海、新疆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以逃避斗争。他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说什么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便，胡宗南有二十多个团兵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即使到得那里也站不住脚，竭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时，张国焘十分猖狂地伸手要权。他见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而他自己却枪多势众，于是借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恶毒攻击遵义会议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他狂妄地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力。毛主席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毛主席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并且严正驳斥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反党谬论，强调指出，红军应当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经过激烈斗争，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和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于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歼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打不赢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命令一、

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张国焘的阴谋诡计所破坏了。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阳奉阴违，耍两面派。会上，在理屈词穷，十分孤立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同意；会后，一回到营地马上翻案。六月三十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党中央，重新抛出他的退却方针，胡说应南打保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还在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背着党中央开黑会，散布谣言，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进行反党、反中央的煽动。两河口会议后，党中央派出由刘伯承、李实春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中央决定。张国焘一方面对慰问团严密封锁，一方面用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四方面军同志的不满和反对。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曾中生同志，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喜讯，禁不住热泪横流，激动万分，他立即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和张国焘，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毛主席，申述一切。张国焘害怕其阴谋罪行被揭露，遂采取卑鄙毒辣手段，将曾中生同志秘密杀害。张国焘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千方百计阻挠北上。七月九日和十八日，张国焘策动他的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为重的精神，耐心地对张国焘进行争取教育。七月十八日，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阴谋破坏，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一个半月之久，错过了打下松潘、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胡宗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各路敌军步步进逼，红军陷于被动地位。

八月四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会上，张国焘坚持错误，再次公开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八月五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的种种谬论，重申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指出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开展反对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革命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党也给了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没有点他的名，还争取他一起北上。

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穿过草地，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并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同志和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经过这一番曲折的斗争，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被挫败了，他才勉强同意北上。八月下旬，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分别过草地、向北开进。

公开打出叛党黑旗

张国焘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遭到可耻失败后，并没有放弃他的反党野心，反而更加猖狂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

中央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墨迹未干，又被张国焘悍然撕毁了。他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重弹“西进”的老调，要红军出洮河以西，过黄河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八月二十四日，党中央电告张国焘，不同意他的错误方针，指出：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到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封锁，则我将处于大不利地位。坚令张国焘按原计划率右路军过草地、迅速出墨洼、班佑。

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率领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在包坐歼敌胡宗南部一个师，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毛主席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并把这一部署于九月一日电告张国焘。但是，左路军过草地到阿坝后，张国焘就借口葛曲河水涨，大作文章，按兵不动了。为了对抗毛主席的部署，他又抛出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左路军和右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地区。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个退却逃跑计划，再三指出：目前只有北进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随右路军活动的徐向前同志，坚持北上，反对南下；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接连打电报给张国焘，力主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指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一意孤行，竟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张国焘竟使用阴谋手段，发动突然袭击，派兵包围总司令部，把朱德、刘伯承同志软禁起来。并强迫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同时，张国焘给他在右路军中的亲信陈昌浩发出密电，妄图果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封密电，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这一罪恶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严正驳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毛主席、周副主席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到达俄界。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决定发给中央委员。决定指出，张国焘向我国西南边境地区逃跑的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不相信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不注意红军中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不但拒绝党的耐心说服教育，而且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公开反抗中央。党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会后，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被迫向康、藏退却，

断送革命，大声疾呼的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九月十七日，毛主席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占天险腊子口，突破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经过艰苦转战，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夺取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与此相反，张国焘强迫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撤回阿坝。九月中旬，他同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召开了“阿坝会议”，通过了所谓《阿坝会议决议》。这个《决议》，颠倒黑白地把张国焘向南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恶毒污蔑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大造反党分裂舆论。九月十五日，张国焘炮制了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吹嘘要“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又发布南下“命令”，欺骗与强迫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从阿坝地区过草地南下。

十月五日，张国焘公开打起叛党黑旗，在绰木碉成立了伪“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自封主席，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为了壮大其反党声势，张国焘拚命收罗党羽，连远在陕北的野心家林彪，也被列为伪中央委员和军委委员。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的广大革命同志，目睹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心急如焚，表现了极大的革命义愤。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痛斥了他的谬论，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张国焘开会围攻朱德同志，威逼他发表反对毛主席和北上抗日的宣言。朱德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怒斥道：我绝不执行你的命令，你就是能把一个人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北上抗日的方针，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张国焘狼狈不堪，无计可施，便残酷地打击迫害朱德、刘伯承同志。曾经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胡底同志，因为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也被秘密杀害了。为了镇压五、九军团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反抗，张国焘委派亲信，强行改编，大批调换干部，以“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等罪名，把一些同志逮捕、杀害。对四方面军内拥护毛主席、坚持北上抗日的革命同志，也疯狂地实行所谓“纪律制裁”，“无情打击”，露出一付法西斯凶相。

十月底，张国焘不顾广大革命同志的反对，拉着四方面军翻越终年极雪的夹金山，继续南下，于十一月间进入宝兴、天全、芦山、名山地区。十二月五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党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要求中央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党中央、毛主席对张国焘南下逃跑、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一方面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组织、放弃一切反党行为；一方面向全体党员公布了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续三）